

# 後疫情時代國際鏈結的挑戰

葉素玲\*

時間來到 2023 年初，全球新冠疫情在持續了三年之後，因著病毒變異而嚴峻程度趨緩。隨著各國開放國境，學術界迎來另一波的國際交流潮，沉寂了三年的國際學術實體交流紛紛漸次展開。表面上，過去三年疫情期間的國際交流像是電影進行中的畫面凍結了一般，現在畫面再次接續運轉，一切看似照舊——除了中間因為疫情產生的斷層。

然而實際上，這三年來因著時空隔離而發展出來的各種視訊會議和研討會形式，繽紛多彩，人們也習慣了線上課程、討論、國際會議及各式的線上研討會（甚至畢業典禮），重新啟動的國際鏈結與交流**不可能、也不宜完全照著老樣子走**。

接下來的國際交流，是否能有更有創意的做法？除了形式上的創新，議題也因著國際情勢詭譎多變、人工智慧和科技的迅速進展、氣候變遷、與能源供應短缺等全球受到影響的議題之快速變化與演進，使得跨領域的鏈結成為必然的趨勢。

但是，要如何做？

以下以自身先前的國際交流經驗為例來說明。在當今跨域和國際交流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下，當時如何促成多年的雙邊互訪，或許可以成為現在開始國際交流的參考。

## 一、臺大—京都大學雙邊交流

### (一) 疫情前

臺大和京都大學是姐妹校，雙方皆有校級的互訪，然而就認知神經科學領域而言，兩校有個共同點是：都沒有一個實體的單位。因為認知神經科學包括了和人類認知歷程，以及神經科學有關的各種不同領域，因此研究者分散在各

---

\*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個系所。這樣一來，在年年舉辦的臺大—京都大學的校級交流，並沒有包括「認知神經科學」這個領域，雖然實情是：單就臺大的神經生物和認知科學中心就有一兩百位成員，京都的情況也類似。要如何將兩校都有很多研究者，但是卻沒有一個實體單位的研究領域人員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是我當時構思的方向。

2014年於日本舉行的亞太視覺會議（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Vision），剛好有幸聽到一場議題新穎的研討會，主題是人類視覺中的統計知覺，例如人類如何「看」出眾多物件在某個向度（例如大小、顏色、明亮度等）的平均值或離散值，以及這類估計精確的程度等。這個研討會結束後，我問主持人是否有興趣和臺灣的學者交流合作，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我邀請了另一位京都大學教授共進午餐，他們兩人都沒有聽過臺大—京都大學的校級百人團互訪，也認同要自己來做。於是，有了初步的共識。

回臺灣以後，恰巧時任學術副校長的陳良基教授，主動提撥學術研究的經費給創新性研究計畫團隊。趁此機會，我們邀集了幾位認知神經科學的教授共同執行一項有關統計規律性知覺與記憶方面的研究，並合開了一門神經系統功能的課程，培育研究人才。也藉由這個經費，邀請了京都大學的教授來臺。由於在臺大有這筆經費的支持，也有教授們的同心協力，促成了第一屆臺灣大學與京都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國際研討會（<http://mrimeg.psy.ntu.edu.tw/doku.php?id=conference:neuro:201509:start>）。

有了第一次研討會的成功經驗，京都大學的研究團隊第二次提出並順利申請到該校充沛的經費補助（第一次未獲補助，因此由臺大的經費支持雙方交流），得以支持接下來兩年的互訪經費，以及在京都舉辦第二屆研討會（[http://www.cv.jinkan.kyoto-u.ac.jp/site/scbre/interaction\\_en/sympo1\\_en/](http://www.cv.jinkan.kyoto-u.ac.jp/site/scbre/interaction_en/sympo1_en/)），後續又申請了該校接續後兩年的國際交流經費，可支付第三屆在臺灣舉行的研討會京都教授們來臺的費用（<https://www.science.ntu.edu.tw/fiveyears/newsletter36/Psy-Yeh.php?NumId=376>）。

這些經費的支援使得我們在疫情前共舉辦了五次互訪的國際研討會，主要參與者雖然是臺大—京都大學兩校的成員，但也逐漸擴充到其他學校及其他相關領域。實際交流內容包括了學者演講、學生的壁報展、實驗室參訪及第二天的圓桌會議，參與的學者和學生數百人。藉由有系統的圓桌會議討論，訂出不同的研究群，每年進行多次的互訪，期間並支援兩邊學生的實習與移地研究。因著臺大和京都大學姐妹校的關係，多位教授也到京都大學短期研究。同時，因為有雙邊簽署的合約，學生或老師住宿皆可依學校的訪問層級進行，方便許多，更深化進一步的合作。

因為有著持續的互訪和年度研討會的進行，院方看到這些努力，也認可研究團隊的積極，不僅時任院長的劉緒宗教授承諾將大力支持兩校認知神經團隊的交流活動，每年一度的研討會提供學者之間、學者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討論交流的機會，以及每年一次的研討會多為成果展的性質而發展實質的合作。

## (二) 解封後

隨著各國解封，和京都停辦了三年的實體交流將陸續展開。同樣是繼續申請兩校的經費用以支付交流所需的費用，但大家都有個共識，線上可以進行的仍持續，但一定要有互相碰面的機會，以促進更進一步的合作，並且要有機制將合作的成果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發表。研究者諸事繁忙，目前進行的方式是持續就擬發表的論文內容討論納入排程，且固定有線上會議，將實體會面時欲達成的目標取得共識後，即可制定原則及時間線，來逐步進行線上的定期討論。

## 二、臺大一東北大學雙邊研討會

### (一) 疫情前

2017 年秋季我休假進修，在日本東北大學電氣與通信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RIEC) 訪問。這是一個類似臺灣電資學院的單位，多數研究者從事的研究是電資相關的軟硬體，少數實驗室從事人類相關的研究，例如邀請我的實驗室是主持人類視覺實驗室的 Satoshi Shioiri 教授 (後來擔任 RIEC 所長)。

在休假進修一陣子，瞭解東北大學的相關領域後，我返臺前向他提議，一同舉辦人工智慧和人類研究相關的研討會。有幸的是，除了獲得他的支持，也得到本校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傅立成主任的支持，得以於 2017 年底於臺大心理系舉辦首屆的臺大暨東北大學人工智慧與人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6](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6))。由於是跨越人文社會和電資多個專業領域，一開始時大家也是邊走邊試，做了各種不同的嘗試，但都盡量讓多個領域的人參與。

同樣地，有了這樣的開始，就迎來了第二年臺大教授一起去仙台的東北大學開研討會的年度盛事 ([http://ai.robo.ntu.edu.tw/result\\_view.php?id=7](http://ai.robo.ntu.edu.tw/result_view.php?id=7))，以及第三、四、五屆的會議。每次參與的眾多師生，可看出議題在 AI and human studies 的主軸下，隨著 AI 的進展和疫情的持續，有著主題與變奏的演進。

## (二) 解封後

今年將於二月底再次聚集日本的仙台，舉辦 2023 NTU-Tohoku Symposium on AI and Human Studies。一樣的一位難求、一宿難覓，不同的是大家也在思考，花費這麼大力氣，想達成的效益是否有些可以藉由線上達成，實體的會議需要將精力用在刀口上，但那是什麼？

當挑戰已然不同，且進入更高的層次，過去舊有的反應已經不再有效時，重複過去的成功模式反而可能成為失敗的來源。戒之、慎之。

## 三、和日本大學進行國際交流的心得

除了京都和東北大學兩所學校持續多年的互訪和開研討會之外，也有和其他學校進行交流與合作的經驗。和歐美比較起來，和日本的交流，旅行所需時間較短及整體所需的經費較少。雖然所費不多，但一定要有經費支援，才有推動的可能。不同於國際交流一次性的活動之後就沒有後續，日本的這兩所大學和臺灣的大學有著類似的研究風氣和水準，是很好的合作對象。臺灣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應能挹注經費支持這類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藉此能增進臺灣研究的能見度、拓展彼此師生的視野、更進一步培植人才。

凡事都需要跨出第一步，京都和東北大學的研討會，都是由我們這邊先開始辦理，因著禮尚往來，對接的學校也跟進，衍生成了多年來一來一往的雙邊會議，以及為準備年度會議而有的互訪交流。積極主動，是國際交流的關鍵要素。

多年來的互訪，得到的體悟是：人與人的連結，感性與理性並重，方能可長可久。且合作要真誠互惠，能感受到雙方的誠意，才能促進更多的心力投注。

## 四、未來方向：擷取線上和實體的優點

三年的疫情造就了各種線上平臺、遠距課程、甚至是混搭（線上+實體）的方式。這些線上技術的進步，讓大家體會到其實不需出門或出遠門，也可以參加國際會議及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

線上通訊有著各種優點，例如可排除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選擇適合自己的工具和平臺、可快速交流、成本又低。然而也有相對應的缺點，例如有時會有技術上的問題、網路不穩定、通話品質不良、通話數量受限、少了非口語如眼神交流或臉部表情的線索，尤其是當人數眾多且不開鏡頭的情況下。整體而言，線上溝通方式是線性、一對一、著重在口語內容、有限的其他非口語或線上線索、不開鏡頭時更是難以掌握對方的動態和意向。

實體交流由於可以面對面的溝通，直接互動，除了口語訊息之外，還可以透過臉部表情、眼神、身體姿勢或聲調動作，或甚至對談雙方的眨眼、身體姿勢的同步性等非口語的線索傳遞訊息，更能促進彼此的同理、信任和認同感，這對於實質長期合作是重要的基礎。相對於線上的一對一、系列地交流，實體交流可多方交流、動態、且非線性的方式，更容易迸發出多對多的複雜度高及非預期的效果。

未來理想的國際鏈結方式，將是擷取線上和實體溝通的優點，優化兩者混搭的效果。例如可以在實際會面前，先安排固定的線上交流，可以由線上處理的先處理，實體見面時，則進行各種包括非口語訊息在內的意圖交換與情感交流。合作要能可長可久，除了議題的契合外，情感是能持續的動力來源。透過各種通訊方式及實體交流，要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益。同樣地，合作的雙方（和人際關係一樣）必須比獨立作業要能有加乘的效果，而彼此都不吃虧，平衡的對等關係，才能共好且持續。

## 五、大學應設立專責單位

臺灣目前的學術現況是，每一領域的學術人口皆少，少數人就要代表特定領域，加上大學教師的服務、教學、研究等三足鼎立的重擔壓身，進行國際交流若沒有專責單位的行政協助，對於有心拓廣國際交流的教師而言，將花費過多的心力在和研究教學無關的聯絡或行政事務上，時間的切割下將影響實際的研究合作，形成一種隱性的懲罰，容易澆熄熱情，不利於持續的推廣。

我在 2019-2020 曾為史丹佛高等行為研究中心 (<https://casbs.stanford.edu>) 的研究員，該中心每年有大約 40 位的國際學者進駐，有 20 位左右的專責人員協助每年一任的學者處理包括簽證、住宿、辦公室、電腦、運動等大小事宜。我們在此中心能盡情地研究與交流 (<https://humanityisland.nccu.edu.tw/su-ling-yeh/>)，得力於其他行政事項由這些專責人員處理妥切，而這些人協助國際學者的行政經驗也得以累積。

由於世界各國有一百多個這類學者進駐型的高等研究中心，包括韓國、中國、印度、波蘭等，但臺灣沒有，因此我多次鼓吹，希望臺灣能建置一個類似的中心 (<https://www.science.ntu.edu.tw/fiveyears/newsletter45/09.Psy-SuLingYeh.pdf>)，讓國際學者能來進駐，瞭解臺灣，透過與國內學者較長期的接觸交流，增進臺灣國際交流的動能，期能細水長流。也許初期規模無法太大，但專責的行政人員之協助是必要的，也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有人或許會質疑，現有的行政人力，處理國際事務包括大宗的如國際生的招生、入學、獎助等問題已經不足了，如何能再多出人力來做此「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其實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先投資資源（包括人力），才能看到想要的結果。都靠熱心的老師撐著做，絕非長久之計。至於經費來源，若有足夠好的願景，可以藉由募款來達成國際研究交流的長遠目的。目標與願景有了，經費籌措順利的話，長遠而雙贏的國際交流自然是水到渠成。

## 六、增聘跨領域的國際交流專業人士

歐美有些大學除了有專責國際研究交流合作的單位之外，也特別聘請跨領域的研究者擔任推廣該學校研究成果及跨系、跨校、跨國的合作關係。例如目前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並橫跨各領域，許多大學分別推出新的校級中心，以人工智慧為主要平臺做跨領域整合的橋梁。這類中心的主任通常需要跨越多個領域的專家，很多大學也開始招募或外聘這類跨領域研究者來整合與進行不同領域的研究。

此外，也有大學因勢利導，創造出行政職務（執行長、國際交流研究專家等職銜），聘請博士級有研究經驗及推廣經驗者來擔任交流與推廣的工作。這類人才通常需要跨越兩三個領域，並有成功的推廣、交流經驗。

這兩種類型的跨領域研究領航者，由於有自身的研究經驗及數個專業的精通，方能觸及到核心問題，走向正確的方向。國際鏈結的研究方向，需要高瞻遠矚，結合兩邊（或多邊）的優勢，得到加乘的效果。目標走向，總是需要走在執行之前。當然，瞭解問題而無法起而行，仍是原地踏步。因此有經驗、熱忱、願景、行動力的領航者就很重要，這些人往往需要伯樂看出其潛能，或創造出這樣的環境，使之能發揮千里之行。

## 七、結語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鏈結，帶來如何持續更新的挑戰，也是轉變的契機，考驗著大家的創意。若能積極主動尋求合作的可能性、訂出目標和願景、思考跨領域的創新、結合線上和實體的優點、以尋求共好共榮的想法做國際鏈結，培養能長期合作的情誼，則或能在研究議題和實際執行上皆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